

这个时代的人

这个时代的人，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既然身处「大时代」，就绝对没有权利去做「小人物」。

|中国复兴档案|

塞疆 / 编

这个时代的人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这个时代的人 / 塞疆编.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26-2107-7

I. ①这… II. ①塞… III. ①成功心理—通俗读物 IV. ①B848. 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5128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X23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2107-7/B • 19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写在前面

长年累月爬行于文字堆中，在看到新闻和观点的同时，也看到了新闻和观点背后的人。顺便摘编出来，与读者诸君分享。由于资料来源碎杂，不方便一一注明出处，在这里特向资料的原始提供者先行致谢！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国家转型与民族复兴的特殊历史使命，需要每一位国民都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编者将分散于不同人身上的故事和话语汇集在一起，就是为了找到一股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说明一点，本书虽名为《这个时代的人》，但受个人阅读和关注范围所限，并不副实，属于带有明显个性痕迹的产品，还望大家体谅！

| 目 录

写在前面	// i
自主第一	// 001
定位第二	// 027
方法第三	// 051
意志第四	// 087
舍弃第五	// 109
冒险第六	// 135
理想第七	// 149
境界第八	// 177
后记	// 215

2011年9月10日，清华大学学生蒋方舟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演讲，题目是《清醒地成长》：

前两天，我看了网易新闻做的一个专题，叫做“CBD的午餐”。专题采访了在北京CBD工作的商业顾问、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媒体人等等。每天的午餐成为了他们最大的烦恼，好的太贵，便宜的太脏。每天在食堂吃太单调，在便利店吃人多得像要打仗。

CBD是北京的中心，它在短短几十年内变得如此繁华漂亮，每次我路过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中国真的成为盛世强国”这一类复杂的感叹。每年都有很多面孔新鲜的年轻人涌入这里，建设这里，维护这里的正常运转，把自己的梦想，捆绑在中国的“强国梦”上。

然而，每天最基本的吃，都成为很大的烦恼，消磨着对生活的热情。而这只不过是年轻人每天几十万烦心事中的一件而已。

今年3月份，我搬出了学校，在外面租房子住。我住的地方叫做五道口，这里有一个别名，叫做“宇宙的中心”。很多门户网站都在这里，例如搜狐、

网易之类的。

每天早晚，我上课放学，都与这些网站的年轻员工们同进同出。我看他们每天早上挤下地铁，晚上再重新挤回拥挤的地铁。脚步匆忙、面色疲惫。他们几人合租一间屋子，个人空间只有一间卧室、一张床和一台电脑而已。

我每次看到他们，总会产生很大的恐惧，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这样了？生活就是这样？未来就是这样？理想，也就是这样了？

我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家里都是铁路系统的。这个系统非常封闭，几乎买断了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我的很多小学同学，现在已经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进入了铁路系统工作，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铁路职工，一生大概都不会离开那座小城市。

我放假回家和他们聊天，他们会表达对自己生活的愤懑与不满，说自己原来的理想是能够去一线城市当白领。他们羡慕我能够离开这座鸡犬相闻的小城，觉得能够来到北京的我，前途是无可限量的。我想到每日所见的白领生活，不知该说些什么。

十五岁的时候，我去湖北最好的高中上学，周围有很多同学是“富二代”，家庭提供的物质保障让他们可以去享受漫长的青春与轻狂，整个世界都像是他们的。今年再次和他们偶然在网上遇见，却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出国了，有的是去读书，有的干脆已经移民。他们也劝我出国，说：

“中国什么都不好，出去了你就不再想回来了。”

听说这个世纪，就会是中国的世纪了。如果世界是个环形大跑道，那么中国已经跑在了前面。

中国内部，则更像一个跑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目标狂飙猛进，同心同力，身不由己。终点是什么呢，是幸福么？是成功么？是北京三环内的一所房子么？大家都一直跑，一直跑，渐渐的，所有人都忘了这个目标是什么，甚至也不敢去过问。

我的小学同学们，那些一辈子也许都生活在故乡的年轻人们，认为自己起步慢、起点低，永远不可能赶超，因此放弃了，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底层而在后面慢慢踱步。

我的高中同学们，看不起这场游戏，所以干脆离开运动场，不陪你们玩儿了。

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离开这个跑道，去反抗这个规则，因为所有人都在跑啊。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不断创造出大量的财富，金钱在中国流动着，资本便调配着每个人的生活。钱流向一线城市，便杀进“北上广”。钱流向体制内，便冲进体制内。

要清醒地成长，必须有脱离这个轨道的勇气。即使轨道之外，并不许诺成功。今年，我陆陆续续接触了一些年轻人，一些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有的高中生放弃了名校，去就读企图建造乌托邦的南方科技大学；有的大学生，刷海报、拉选票，去参选人大代表；有的师兄师姐毕业了，也放弃名校、外企这样的选择，去做一些他们认为能够改造社会的事情。

没有什么“形势永远比人强”，因为所有的墙壁，其实都是门。

如果一千个人中，有一百个人，有自己与大环境格格不入的内心世界。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有离开这个跑道，忠于内心的勇气。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获得了成功。那么未来的社会，也许会大不一样吧。

未来的中国，会变成一片原野。有跑的、跳的、在阳光下晒太阳的。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盛世强国下的年轻人们，人人有选择的自由，和择善从之的勇气。

学者刘东在恢复了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着陈寅恪追思王国维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人请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写一篇介绍他的老师陈寅恪如何治学的文章，他当即答道：“我不能写，我已经被老师逐出师门了，因为我没能坚持老师教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我不配写。”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曾经给校长周其凤写过信，建议用“独立的学术自由的思想”做北大的校训。他说：“当然我知道这建议不会被采纳。明知不会被采纳，我也要这样表达。我一生信奉和追求的境界，就是思想的自由、学术的独立。”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得，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几乎对每一届毕业生，

蒋南翔校长作报告的时候都要讲，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有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做到“听话出活”，这一辈子就好过。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杨继绳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清华出来的人，听话的，出活儿的人，都混得比较好。“不听话，你有再大本事也不行。我当时也觉得，听话是理所当然。”杨继绳说。不过，往深处想，他认为蒋校长这些话好像父亲对儿子讲的，不像教育家讲的。

杨继绳退休后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工作，他的同事徐庆全描述说，杨的装束很有幽默感，甚至有点喜剧色彩。从堂堂清华大学毕业，又在国家通讯社工作多年，他仿佛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朴素的农民装扮。说得高一点，是七八十年代常见的小干部形象：背一个那种低档次会议上发的廉价的烂包，穿着疑似于中山装的休闲装。但他却一点也不低调，进办公室总是昂首阔步的。刚和他成为同事时，每每看到他这副装束，我就情不自禁地偷着乐。有一次他偶尔回头看见我在乐，竟然一脸无辜地问：“有什么好事？”搞得我啼笑皆非。

在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研讨会上发言时，画家陈丹青谈到了“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的问题，他使用了一连串的疑问句：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哪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1958年出生的郭明义，是辽宁鞍山钢铁集团齐大山矿的一名公路管理员，他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好事，无数次捐款献血，被人称为“雷锋传人”。在郭明义被官方树为榜样宣传开来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同学聚会，即便是下岗吃低保的同学，也衣着光鲜，只有他，依然是一身灰色的矿工服。久违的同学见面，唠嗑的唠嗑，

拥抱的拥抱，郭明义却显得颇不合群，他不仅迟到，而且早退。大家起哄让他表演节目，他张嘴就唱了一首《爱的奉献》，一字不减。他还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郭明义的一位同学说，虽然大家都鼓了掌，但掌声复杂，有真心赞扬的，也有起哄的。对郭明义的行为，不只是同学，他身边的工友们，早先同样也是不理解。他们给他起的外号很多，“郭大傻”、“郭败家”，甚至有一段时间，都以为他有“病”。

画家吴冠中年轻时受益于吴大羽，而吴大羽却告诉他：贼（害）人者常是师，信人亦足以自误。199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主办“吴冠中师生作品展”，展出了吴冠中和他亲自教授过的13位出色弟子的画作。令人称奇的是，这13位弟子的作品，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与吴冠中相近或相仿。也就是说，这13位弟子，创造出了13个流派，而这13个流派，居然没有一个可以叫做“吴门”的。对此，吴冠中非常满意，童心大发，还写出了这样一幅展览的对子：新旧之际无怨颂，唯真与伪为大敌；横批为不囿于师承，不屈于风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在总结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时说，初做学生的时候是个描红阶段，就是全面地向老师学，甚至某种程度的模仿。就像我们写字一样，启功是著名的书法家，向他学写字就得先描红，最大限度地学这个老师的特点。但是模仿到一定阶段，你就必须走出来，否则的话，你就会永远在老师的阴影底下。你的导师越强，他对你的影响越大，你就越要有反抗他的力量，走出他的阴影，否则永远是老师的影子，这样的学生是没有出息的。我想真正的老师也会期待自己的学生不要永远像自己。永远像老师的学生绝对是比老师更差的学生，这是个绝对规律。

留美归来的生物学博士方舟子，没有在科研单位做学问，而是以民间个人的身份，搞起了打假活动。他揭露伪科学，揭露学术腐败，揭露一些公众人物的假学历，得罪了很多，搞得官司缠身，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周围的人说，方舟子对真相有“洁癖”，打假时从不讲究策略，从不“得饶人处且饶人”，为了自认的科学和真理完全不顾朋友，所以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圈子，就像无法找到大部队的堂吉珂德一样，孤身挑战

一个又一个风车。有好心人提醒方舟子，“战线拉得太长了”，但是他在微博上的一句话，将他的个性展露无遗：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世的任何忠告。方舟子的打假活动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并说：“期待中国社会不再需要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抗拒群魔的那一天。”

文化圈里的人认为作家刘心武脾气比较古怪，对此他表示认同，说主要是在人际关系上很不愿意将就，“因为一个人你说是一个生命个体，那么又在群体中生活；一个人总要和他人发生关系。在和他人发生关系时，当然你要保持你的独立性，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起码的、公关的这种能力和技巧，那么这方面我基本是劣等生。”

拍摄过《盲井》、《盲山》的电影人李杨，这样形容自己脱离体制之后的不适应：“当你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你却不会选了。我就像一个捆绑的人被放在小坛子里，过了几年以后，坛子打碎，我被放出来，别人说你可以走了，我却不会走路，身体还维持着那个坛子的形状。”

2011年3月，画家刘小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李宏宇采访时，谈起了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我去台湾，侯孝贤陪我吃饭，坐地铁，倒了好几趟车，40分钟以后到了一个小馆子，东北菜。他觉得我是东北人。我说你这么大牌，应该有个司机至少自己开车吧，60岁的人了。他说我完全可以有，但我是电影工作者，我要每天听大众谈什么，否则我就会被架空了。”刘小东评价“这很动人，他害怕脱离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态度”，并说“反过来，在内地这样有名的人，包括我自己，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

从事英语教育的罗永浩说：希望那些喜欢用“枪打出头鸟”这样的道理教训年轻人，并且因此觉得自己很成熟的中国人有一天能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专门躲枪子儿的。

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刘再复曾经感叹：“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故事。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他引用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刘再复说：“在许多时间中，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人，即不是‘关系中人’，而是自然中人。”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在北京病逝。3天后，他的世交李慎之前去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火化仪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因为遗体只是在八宝山的第二告别室停放了20多分钟，在场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辈子的杨绛先生和几个亲属，社科院的一两个领导和几个办事人员，一共只有十来个人。偌大的告别室，空荡荡的，没有松柏，没有鲜花，更没有花圈和挽联，甚至没有照片。杨绛先生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

“第二天一早，又因为《胡绳全书》出版，我应邀参加发行式，那可真是冠盖云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而且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从大门、二门到三门，都设了岗卫，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

钱钟书去世后，黄永玉写的悼念文章中提到几则逸事：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

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忙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一个外国读者看完《围城》之后，十分敬佩，想要登门拜访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在钱钟书八十寿辰之际，有关部门要给他大张旗鼓地祝寿。对此，钱钟书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事后有人问及原因，钱钟书答曰：“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

刘再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与钱钟书是同事。他眼里的钱钟书是这样的：“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钱钟书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究其原因，刘再复认为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还有对社会的防范心理。

钱钟书一生，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有人认为是他瞧不起组织，是骄傲。他的夫人杨绛说，钱钟书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并非瞧不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于1989年12月13日在上海病逝。他去世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是在苏州现代文学理事会上：“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当时很多年轻人都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王瑶说：“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

王振耀1989年进入民政部，历任处长、副司长、司长职务，很多熟悉的朋友和同事都称他为“学者型的官员”。王振耀说：“这里既有褒的含义，即认为有一定学问，对问题很有研究，但也有贬的成分，即认为不熟悉官场的潜规则，只看到表面的工作和程序。我心里其实很清楚，那些潜规则，不是不可学，而是不能学，因为学会那个，就会失掉自身，就会将一生的安身立命之本丢掉。”

2001年，王石去云南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发言时讲到万科的不行贿，没有听到掌声。后来发言的一位企业家嘉宾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

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他说完这句话，台下 300 多位听众报以热烈掌声。这让坐在台上的王石很尴尬，也给了王石很大刺激，行贿的反而成英雄了？

王石将“不行贿”作为一种行为底线，是有来由的。他自己说：“创业之初，我在深圳搞玉米贸易，为了能弄到两个计划外火车皮指标，让同事给火车站的货运主任送去了两条烟，人家没有收，打回来了。我第一反应：是不是我送的礼太轻？进一步接触，这位主任批给了我两个计划外火车皮的指标，但依然没有收下我的香烟。他表示：之前曾观察过我，还看到我和工人一起扛饲料大包，觉得我是一个认真做事的年轻人。对这样有志气、实干的年轻人，主任十分愿意帮一把忙！”王石对这位主任一直心怀感激，“这件事情，让我萌生了多年一直坚守的信念，只要你真心诚意，勤恳做事，不用走歪门邪道也可以‘成事’，可以实现理想。”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说：我记得做业务员的时候，我们三个女的业务员，在一起交流。我听她们讲，哎呀，我找了某某领导啊，跟他怎么样搞好关系啊，请人家吃下饭啊，说点好听的啊，可能就解决了问题。我听着就觉得，这不是凭我的实力，去做一件事情。

我不喝酒，我不吃饭，这是我的原则。我做销售那么多年，我的方法很简单，你拿了我三十万的货，我叫你半个月就把它卖掉了，你必须还要拿我的货。如果我跟那两个女同胞一样了，天天没事就跟人家去喝酒啊，唱歌啊，然后女同志又把女性的特点表现出来，装作很弱者啊，让别人同情啊，可能今天能拿到十万、一百万甚至一千万，但是明天还能不能拿到呢，没有了。而你把货卖掉了呢，那自然而然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你必须还要拿我的货。

我现在出差经常还是一个人。很多人都跟我说，有的企业老板做一两百个亿，甚至十个亿，可能前后都有很多人跟着，不是秘书就是保镖。我到现在为止一千个亿，还是依然一个人，想到哪里去，自己来来去去，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跟普通人是一样的，我的职务、我的权力只不过在工作当中。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1989 年北

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留京工作。2011年3月20日，他在重庆大学演讲时说，“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不良的现象，我告诉你，去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

白岩松在《幸福了吗？》一书中提到：从我进电视台起，这十几年，从来没进过两任台长的办公室，从杨伟光到赵化勇。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找的，认真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同理，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连新闻中心主任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而且无一例外，都是主任找我。我感谢这些领导，也坚信着自己的想法，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能有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于做事来说，太难得。

朱苏力2001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但他不喜欢应酬，而且有勇气拒绝应酬，几乎每天中午在办公室吃盒饭。他这方面的传说很多，其中一个发生在武汉，当地法院院长邀请他吃饭，他说没时间，因为晚上要回宾馆看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中文理分班时学理科，报考北京大学，出国留学，回国创业，都是自己决定。在大学班主任陈文广眼中，李彦宏行事低调，为人平和，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唯有一点特别突出：“他一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的大姐李秀华说：“别人反对，他不怒，不愿跟人交涉，也不听别人的，自己拿主意。”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家张春霖是吴敬琏的第一个博士生，他讲的一件小事很能反映吴敬琏的性格。张春霖有一年过年回家，返京之后探望吴敬琏，吴敬琏一张口就问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何，有没有什么变化，压根就想不到要嘘寒问暖地关心学生本人的情况。“他就是这样的人，在人情世故方面很不擅长，对于人际关系也不太在意。”吴敬琏的女儿吴晓莲说。

曾经担任吴敬琏多年研究助手的自由撰稿人柳红认为，吴敬琏这个人其实有点“迂”，“比如，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被国家高层领导人请去

谈经济形势，他会用很长时间去讲他的看法，没想到别人也很珍惜在领导人面前讲话的机会，他这样做就让人家不高兴了。但是其实他才不是要在领导面前怎么样，他就是迂，他认定的那点事，他就是要跟你一直讲。有一次我们去浙江考察，我看到大家在途中都睡觉，只有他一个人不睡，他干吗呢，他跟他同座位的某个老省长的小秘书认真地讲国有企业改革，途中有几个小时他就讲了几个小时。你想，他跟一个看上去什么都不懂的小秘书都能一讲就讲好几个小时，那在领导那儿，他可能就他认为重要的某个问题上就这么讲开了，但是，他就会被别人或是误解、或是嫉妒，引起别人的不高兴。”

曾有记者问吴敬琏：“你對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吴敬琏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不重要的，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是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吴晓莲也说：“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

2012年6月10日，林毅夫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务上卸任归来，与夫人陈云英一起，出现在首都机场。

迎候他们的是十多个人的欢迎队伍，既有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的官方代表，也有他们的家人和北大的同事。

有去过现场的人说：“本来是个简单寒暄的场合，但讲了几句开场白后，林老师就开始大谈对世界经济的看法，说了半个小时，在夫人提醒下才结束。”

如同事们所言，这是林毅夫一贯的风格，“永远在谈经济”。与林毅夫有过研究上的合作的蔡昉也说，两个人从1987年认识起，二十几年的交往，见面几乎只谈“学术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在澳大利亚留学、工作期间，一度住在任教莫纳什大学的杨小凯家。韦森形容杨小凯：“一谈思想方面的话题，他可以滔滔不绝；一谈到吃喝这些日常生活话题，他一两句说完，就没话了。”